

廣西文史資料

第十六輯

廣西文史資料

第十六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回忆陈光（陈扬）同志……………罗培元（1）

回忆广西学生军……………靳为霖（6）

我所知道广西师专的一些情况……………路 璋（37）

我所知道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黄露茜（60）

解放前广西日报的几个事件……………吴克清（72）

解放前的南宁话剧活动……………雷 成（79）

沈鸿英事略……………韦瑞霖辑（90）

谭浩明事略……………刘立道（102）

韦云淞事略……………冯 璜（113）

新桂系消灭沈鸿英的经过……………虞世熙（119）

两次“督剿”武宣贵县游击队的经过……………莫树杰（122）

新桂系时期的苗瑶教育……………唐兆民（129）

桂北全县的瑶民起义……………韦秀国 陈法铎（143）

解放前的玉林纺织业……………杨美颢（150）

解放前的廉州中学……………韩美国（157）

两广合办硫酸厂……………钟杰生（174）

广西文场……………韦建章（178）

抗日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简介……………魏华龄（184）

日本侵略军第二次进攻广西的片断回忆……………李 微（213）

日军侵入梧州前后……………罗沛端（224）

《李宗仁回忆录》的补充注释..... (229)

南宁史料四则..... (234)

质疑·补充·订正.....李 骏等 (237)

.....

.....

.....

.....

.....

回忆陈光（陈扬）同志

罗培元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侵略广西，当时在桂北敌后的我党的三个方面的组织，即柳州日报特委，桂林文化支部与融县地方党组织，都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桂北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领导，集中力量，配合行动，我们三方面共同决定各派出代表二人成立桂北工委（也叫临时联席会议），作为当时领导桂北敌后斗争的统一领导机构。工委决定三方面组织各自负责审查恢复那些因防敌人破坏而暂时停止组织活动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和发展党组织。这项决定对于当时抗日武装斗争的迅速开展和广泛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后来得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共广西省工委负责人批准。柳州日报特别支部根据工委决定，恢复了一部份暂停组织活动的党员的组织关系。陈光同志就是这些恢复组织活动的党员中的一个。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冬或一九四五年初间，柳州日报总编辑张琛同志对我介绍了陈光的情况，大意说：陈扬是广东梅县人，中共党员，在两广地下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时，上级通知他暂时停止组织活动，现在到报社来找寻党组织，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派出工作。当时，鉴于没有条件可以对陈扬同志的全部历史作仔细的审查，而且各方面的斗争都急切需要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我凭着张琛同志历来表现的对党负责精神和在处理党组织问题上的严肃态度，完全相信张琛同志的介绍，共同决定恢复陈扬

同志的党的组织关系，并派他到当时我党直接领导的由我兼任队长骆维强同志任副队长的抗日武装队（这个队是以柳州日报员工为主体吸收地方抗日青年参加的，它的公开合法名称叫桂北行署警卫队）任指导员。由于我要照管全面的工作，我不在队时，该队的具体领导工作，是由骆维强和陈扬两同志负责。

陈扬同志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支抗日武装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发展壮大的历程。这个武装队在敌后罗城县的龙岸成立，由我和骆维强和陈扬两同志率领到同日伪武装势力更加接近的地区——罗城县的黄金乡、四明乡、小长安乡、融县的和睦乡、龙头乡，柳城县的洛岸乡、古砦乡、大埔镇一带活动。武装队每到一处就广泛建立革命联系，普遍用多种多样方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广泛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发动地方进步青年携带枪枝武器参加我们的武装队；此外还广泛进行交朋友的活动，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武装队本身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所经过的地方都播下革命的种子，建立了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武装活动组织和据点。它和桂北工委领导的另一支抗日武装队——融县青年抗日挺进队成为桂北一带进步的革命青年向往的队伍。这些青年往往不辞危险，越过敌伪的重重封锁线到我们的武装队来建立革命的联系，取得党的领导。正因为这个队伍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取得这样的成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由特务头子戴笠所指挥的特务武装之一——桂北别动队，就千方百计来侦察它，包围它，破坏它，阴谋把这愈燃愈旺的革命烈火一举扑灭。当然敌人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抗日武装队的指导员，陈扬同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这支抗日武装队建立之前，柳州日报社的党组织面临着一个是在桂北敌后搞抗日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是在困难面前退却，甚至散伙向当时所谓的“大后方”逃跑呢？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陈扬同志参加了工作，拥护我们党组织

的正确方针，并坚决表示参加武装队伍，对当时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他担任武装队指导员期间，他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对于队伍的每一行动，在上级作出决定之后，都能在队员中作好思想准备，进行教育说服，比如武装队初成立时，就要说服一部份思想还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工和知识分子，由原来的拈铅字、抓笔杆转而扛枪杆带手榴弹，当队伍要由距离敌伪和反动派武装较远的地方，逐步接近反动武装势力范围和敌伪前线，当队伍从初时困难较少，逐步遇到较多困难的时候，对武装队员是要做大量的政治动员和思想说服工作的。就是对于政治思想较进步的那部份，也要做许多思想工作，才能使队伍愈向前进，愈能保持团结战斗的精神和旺盛的士气。在这方面，陈扬同志作为一个新参加工作，又和绝大部份队员是新相识的指导员，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他有坚定不移地依靠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学习，以身作则，以及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优良品质，他遇到困难时就找上级请示报告，很多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由于他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除了同战士们“三同”之外，还同战士们一样自背行李，自扛长枪，遇上有病员，就帮病员背背包，关心他们的医疗和伙食。陈扬同志还同战士们一同接受步兵教练，学打靶，他向队员们讲政治课，也同队员们一同听别的同志所讲的政治课，一块唱革命歌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受任务从来不讲价钱，所以陈扬同志在战士们中很快就建立了作为一个指导员所应有的政治威信，加上他有一种平易近人，耐心教育，工作细致的优点和长处，是副队长骆维强同志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作为上级，我和张琛同志也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好党员。当我没有同武装队在一起活动的时候，即便是在较困难的环境中，也十分相信骆、陈两位同志是能坚决贯彻好党组织的方针政策，能完成党的任务把队伍带好的。事实也是如此。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日寇自广西大撤退，桂北敌后的条件改变了，日寇无条件投降，全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桂北工委分

析了新的斗争形势，认为当时桂北的人民武装力量还没有形成一支可以在远离别的抗日武装斗争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反动派优势兵力四面包围之中的情况下继续武装斗争的队伍，因此决定采取掩蔽武装，保存力量，分散人员，改变斗争方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当时武装斗争一步一步的走向高潮，胜利的局面一天天开展的情形下，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在思想政治教育，在分散掩蔽的措施上，都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经过党一系列的正确领导部署，柳州日报社的武装队终于实现了有条不紊的分散掩蔽，一无损失地完成了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陈扬同志和其他的党员一起，对队员们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并且以身作则，服从党交给他的新的任务，改变了原先的搞武装斗争方式，就地掩蔽下来，采取秘密的斗争方式。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起，柳州日报的党员中的大部份和已相当暴露的进步分子先后撤离桂北，但鉴于有少数党员还有可能充分利用柳州日报社的条件掩蔽下来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报社特支和融县地方党组织商定把陈扬同志的组织关系转交给柳州地方党组织，还把那部份打算长期掩蔽下来的党员交给陈扬同志负责领导。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我介绍陈扬同志到柳州的龙城中学教书，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坚持工作。

由于我在广西已相当暴露，所以自从陈扬同志离开报社之后，我便尽量减少同他的往来，但因为组织上的需要，我们还有过两次组织上的联系。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我撤出柳州日报之前，我将原先武装队留下的一批枪枝子弹，以及我从柳州日报弄出来的一个收音机（可以收到当时在延安的党中央通讯社新华社发出的消息）的存放地点和取用手续告诉他，要求他绝对保守秘密，并在党需要动用这些武器同反动派在战场上相见的时候，通过党员罗英同志的关系，取出来发挥它的作用；第二次是将我们自柳州日报社弄出来的一部份印刷机、铅字等器材所建立的名为联华印刷厂的管理权交给他，由他代表地下党组织来管

理、使用。承担这两项工作任务，在国民党反动派已决定大打内战的情况下是相当危险的，陈扬同志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同陈扬同志有过任何联系了。

一九五〇年广西解放后，我听到两个关于陈扬同志的消息：一个是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陈扬同志和同他一起战斗在桂北的同志，在时机成熟的一九四九年把我们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掩蔽下来尚未生锈的枪枝和子弹以及收音机等完全取去，组织了与南下解放大军配合作战的武装队伍，在消除李、白、黄反动派，解放广西的斗争中起了应有的作用，这是十分令人兴奋的。可是，另一个消息却是说，在解放广西前夕，陈扬同志在他担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的时候，被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到严刑拷打而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消息如此确凿，使我十分悲痛。陈扬同志的鲜血并不白流，二十多年来，他光辉的榜样不仅一直鼓舞着像我们这些曾经同他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而且鼓舞着一切知道他的斗争事迹的革命的人们，陈扬同志没有死，他永远活在革命的人们的心中。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广州

回 忆 广 西 学 生 军

靳为霖

一、从第一第二次广西学生军说起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两广当局发动“六一”运动，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救国，还以广西师专学生为主并招收了部分中学生组成了第一次广西学生军，从事宣传动员工作，以争取人民对他们的支持；桂系当局是假借要求北上抗日的名义，同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争权。但广西的进步学生却借此机会“假戏真做”，认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认识到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道路，从而认清了桂系当局的假抗日真内战的面目；并在这次下乡宣传中受到了与群众相结合及战时动员工作的实际锻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梧州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轰炸西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游行，击败了桂系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的威力。托派在广西曾一度有一定的活动市场，他们大唱“革命”高调，迷惑青年，诬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对国民党投降，妄图破坏团结抗日。党领导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西安事变后，团结抗日局面的出现和发展，从事实上粉碎了托派的谰言，党的正确政策越发深入人心，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广西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也更为高涨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和“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部分部队调赴前线作战，同时组织了第二次广西学生军随军到抗日前线作战地工作。不少进步学生积极参加，随后他们组织了有共产党员易凤英、黎琦新等为主的广西学生军代表团，带着有关图片和战利品，回到广西举行巡回展览和宣传，给广西学生以很大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广西学生参加抗战救国和献身革命的斗争热情。

历史的战斗实践，党在广西学生中的教育和影响，日寇的全面进攻和中国开展了全面抗战的斗争形势，使广西学生继承了革命的光荣传统，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的抗日热情是高昂的，献身革命的精神是积极的。武汉及广州沦陷之后当广西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危急时刻，广西青年学生奋起参加了第三次广西学生军，深入乡村宣传鼓舞组织群众，坚决为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而战斗。

二、第三次广西学生军的成立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武汉和广州，两地很快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狼狈败退，国民政府撤到重庆，不少机关迁到桂林，大批难民涌入广西，局势很为紧张。桂系当局为了自救，决定招收第三次广西学生军，宣传组织发动群众，配合部队作战，抵御日寇的侵略。抗战初期，广西一部分部队调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的部队对日作战是积极的。但是，他们同整个国民党军队一样，只是单纯的军事作战，不肯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全民抗战，遭致了上海、南京和其他战线上的惨败，广西部队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员后，收容战地知识青年，创办了潢川青年军团，以第二次的广西学生军任政治指导员，组织青年从事宣传动员群众的战地工作，军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作战较为主动，也获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尝到了

一定的甜头。形势迫使桂系当局伪装开明，笼络人心，争取青年学生和群众对他们的支持，因此，在广西面临着日寇直接侵占的危急关头，桂系当局决定组织第三次广西学生军。他们以广西绥靖公署的名义公开在报上登载招收学生军布告，同时由广西省政府布置各校向在校学生动员参加学生军。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广西学生，出于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热情和责任感，一致奋起参军。党也动员了在校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因此报名人员非常踊跃。原来预定招收一千多人，组织一个学生军团，由于人数一再突破，结果达到四千多人，桂系当局决定扩编为三个团，设立了广西学生军司令部。由广西绥靖公署的参谋长后改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的夏威兼任学生军司令员，从前线回来的郑昌藩任副司令员，筹备初期由韦贇唐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即改由刘士衡任政治部主任，刘仲容任副主任，曾庸夫任参谋处主任，许彬元任副官处主任，谢国馨(?)任政治部秘书，陈平任组训科长，杨春生任宣传科长，罗云秀任总务科长，吴华梓、李支任视察员。第一团团团长原为林枢，林为福建人，与华侨有关系，派赴南洋募捐后改为黄冠南任团长，陈业勋任团政治主任；第二团团团长肖光保，政治主任李劲（现名李大庸），李生病后改为靳为霖；第三团团团长蒋晃，政治主任于东聘。团以下设三个大队，配属一个女生中队；大队设四个男生中队，中队设三个分队，分队设四个班，类似部队的团营连排班的建制。第一团学生以桂林、平乐、柳宜一带学生为主编成，第二团以梧州、桂平、玉林一带学生及部份南宁学生为主编成，第三团以南宁、宾阳及左右江一带学生为主编成。当时也有部分从广东及外地逃难来广西的青年报名参加了学生军。

学生军的班长大多由大学、高中及部分初中高年级生担任，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政工人员中也有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因此，党在学生军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当时条件下，学生军的进步倾向较为明显。那时为了发

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部队积极抗战，避免引起国民党的顾虑，党决定不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在广西学生军中也就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党只是在团内的干部中和学生中分别指定一个党员负责党的个别联系工作，第二团干部中党的联系人是杨美灏，学生中的党的联系人是黄廷机；第一团听说是王祥彻，第三团情况不详。后来，国民党中央和桂系当局更加顽固反动，他们已统一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立场，形势有所变化，在一九四〇年七、八月间，党决定在学生军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由莫朗、（杨烈）张希和、丘文惠（丘冰）等人负责，每个大、中队相继建立了支部或小组，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党在学生军的领导作用就更为加强了。由于党在学生军中所发挥的作用，学生军成为了党在广西的一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进步力量，在桂南战事中作出了贡献。

三、荔浦建团初期

广西学生军成立初期，司令部及一、三两团设在桂林，二团则设在荔浦。一九三八年十一、十二月间，学生从各地陆续前来报到，司令部及各团的军政人员也正在从各地各单位抽调，领导机构还很不健全。二团在荔浦建立时，政工人员中开始只有团政治主任李劲和大队指导员黄汉杰、靳为霖等人，大中队及分队长的人员也还没配齐。在这样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学生中的代表人物协助抓工作。这一期间从各地前来报到学生中的带队者，实际上成了团部依靠的骨干。当时学生陆续到来，班组逐步建成，还未开始正规训练，学生满怀热情来到，由于领导缺人，各方面尚未上轨道，学习和生活不够紧张，群众对伙食及文娱活动意见较多，情绪还不稳定。经大家争取得到团长肖光保的同意，以中队为单位，在各班正副班长会议上举选产生了生活委员会，在当时各大中队领导人员未配齐的情况下，实际上成了学生自己管理自

己的群众组织，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生活委员会负责组织读报、讨论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出版墙报、参加采购和监督协助改善伙食等工作，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内容，活跃和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后来到桂林后，各大中队的军政干部已陆续调齐，但生活委员会这一学生群众组织形式已固定了下来，并早已发挥了作用，他们也不得不依靠生活委员会的协助来开展工作。群众组织受到尊重和发挥作用，这是二团初期就形成的一个特殊情况，大大有利于我们后来工作的开展。

二团团长沙光保曾是桂系主办的国民党党务学校的学员，该校受训学员结业后被安排在广西各级党政军机关任职，其中一部分人还专门负责特务工作，如广西特务头子梁学基及栗国宝、卢英龙等人。肖光保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已擅长和习惯于用特务方式进行工作。二团在荔浦成立后，肖光保就在他所认为合适的学生中选了一些人，和他直接建立联系，要求不经过大中队干部向他直接汇报工作，反映学生思想情况，林健虎就是这样和肖光保搭上关系的。肖光保为人很自负，认为自己有一套本领，学生军二团已在他的完全控制之下。其实他所选中的人员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至于确是他的忠实走狗的人，我们则通知了认为可靠的积极分子，对他们要提高警惕。当时二团的政工人员中有一部分是党员和进步人士，群众组织的生活委员会也基本控制在进步学生手中，班组长中也有一些党员和民主进步的积极分子，虽然表面上我们是听命于肖光保和支持他，以取得他的信任而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二团实际上是在党的影响下和党员的带动下，沿着团结抗战和进步的方向发展，党在二团发挥了有效的组织领导作用。一、三两团的政治力量虽与二团不尽相同，骨干中也有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学生群众多数受到党的影响，抗日热情高，追求进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二团接到学生军司令部的命令到桂林集中。我们提出了赶到桂林过元旦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口号，

同学们很为兴奋，立即作好行军准备。我们依靠生活委员会和班组长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工作。动员同学们借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还清，临走前要清扫借住的房间和院子，要向房东致谢和告别。长期受惯了国民党军队欺压骚扰的老百姓，看到学生军这样的爱民行为，很是感动。在我们临别时，他们送茶送水，自动出来欢送。给同学们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为赶到桂林过新年的愿望和群众欢送时的热情所激励，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行军。由于缺乏行军经验，走了半天，有的人就脚板起泡，整个队伍的行军速度减慢了，并且有人掉队。团部决定组织收容队，不少骨干分子主动留在最后承担了收容队的任务。他们帮助掉队的同志背行李，扶着有困难的同志慢慢行走，勉励他们鼓起勇气，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这样，连续走了三天，在一九三八年的除夕之夜，开进了已是万家灯火的桂林城，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的行军。

四、桂林集训

一九三九年一月，学生军全部集中到桂林训练。由白崇禧、夏威向全体学生作了抗战形势和学生军任务的多次报告，其余的时间则由各团按排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这时军政人员虽已陆续到来，但仍未全部配齐，而且能讲大课的人也不多，这倒使我们有了邀请外面进步人士来做报告的机会。在二团，我们请了广西部队的军长后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的韦云淞来做报告，借他的牌子装装门面，而主要的则是争取到了十八集团军驻桂办事处，当时从武汉撤到桂林的以郭沫若同志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及范长江、陈农菲等同志组织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支持，先后邀请了范长江、夏衍、陈农菲、洪深、张志让、张铁生、陆诒等新闻界、文化界人士前来报告抗战形势、战地见闻；还邀请了日本反战同盟的鹿地亘、台湾抗日组织的秘书张一

之（即张毕来）、朝鲜抗日义勇队的金××（可能是金昌满）等人前来报告这些组织的抗日活动情况和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报告中，对当前抗战形势、前线军民战斗的英勇事迹、日寇的凶残暴行和战区人民遭受屠杀的惨状、军队败退和人民逃难的令人痛心的情况、单纯军事抗战和政治上不民主所造成的恶果、上海、南京失守和武汉、广州又相继沦陷的有关情况，都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同时提出了如何加强团结、实行民主、一致抗日、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意见。尤其是范长江同志刚从战地采访归来不久，以他的亲自所见所闻作了生动具体的介绍，令人深受教育，极为感动，多次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其他同志报告的内容，有的是自己的耳闻目睹，有的是得悉内情，有的是业务有关，他们所讲的情况和引出的正确结论，也很为详尽、动人和令人信服。大家听了之后，对当前形势、存在问题和奋斗方向，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学们对学生军承担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抗战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学习政治、军事和群众工作方法的自觉性和迫切感也大大提高，士气很为旺盛。

在此期间，我们得知叶剑英同志即将经过桂林转往重庆，特地经过新华日报桂林分处的张尔华同志向十八集团军驻桂办事处李克农同志联系好，当叶剑英同志到达桂林后立即请他来为我们作报告。当时还是抗战前期，桂系参加了抗日战争，同时也在与各方面力量拉关系并与中共有交往，以加强桂系的地位和提高自己的威信。肖光保为了争取学生对他的拥护，更是表示他也是积极抗战和支持学生的进步倾向的，因此同意了对叶剑英同志的邀请。那天我们去桂北路十八集团军驻桂办事处接叶剑英同志来到后，肖光保亲自接待了他，然后由我们陪同去对学生作报告。叶剑英同志讲游击战争问题，开始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话，大家听了较为吃力。二团大都是梧州、玉林、南宁、桂平一带能讲广东方言的人，他们请叶剑英同志讲广东话，他接受了大家的请

求，改用广东话讲演，既流利又亲切，引起了全场的欢声，情绪很为活跃。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军事斗争和动员群众的情况，讲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分析了抗战的发展趋势和最后必胜的光明前途。同志们越听越兴奋，越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一连几个小时的报告，不顾腰酸背疼，连动都不肯动一下，一直安静地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唯恐漏了一句话、一个字。当听到精彩处，会场上不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听到有趣时，又禁不住轰堂大笑起来。叶剑英同志的报告紧紧地同全体学生的心心相连，道出了人们的心愿，指出了奋斗的方向。报告完后，叶剑英同志被大家团团围住，久久不肯散去，有的人还拿出笔记本来请他签名，叶剑英同志高兴地满足了同志们的愿望。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的结束会上见到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时，向他们谈起这次在桂林对广西学生军的报告，虽然已时隔十年，当时的情景，叶剑英同志还记得很清楚，高兴地向我问起广西学生军后来的情况。他的这次讲话，很为振奋人心，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学生军一团、三团也进行了军事、政治训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第一团女生队还邀请了邓颖超同志前来讲话，非常振奋人心，影响很大；但那时一团却请了托派分子和有托派观点的所谓六君子中的谭辅之、曾庸夫、苏国夫、徐××等人去作报告，他们在讲话中，恶意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报告很不得人心和不受欢迎，同女生队和二团的情况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我们组织了这些报告，尤其是叶剑英同志的讲话，给二团学生的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大多数同志政治倾向鲜明，抗战积极性高昂，决心以充沛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即将来临的抗日前线的战斗。

在桂林时，学生军虽然以训练为主，也适当进行了一些宣传